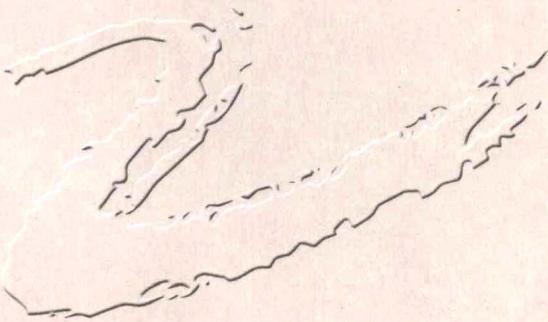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康有为

朱义禄◎著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康有为

朱义禄◎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有为 / 朱义禄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9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538-3

I . 康… II . 朱… III . 康有为(1858~1927)—传记
IV . 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820 号

出版人：李安泰

策划：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尚语

特约编辑：张守平

整体设计：向炜高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康有为

KANGYOUWEI

朱义禄◎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660×960 1/16 印张：10 字数：100 千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978-7-5415-3538-3

定价：16.80 元

目 录

第1章 东挦西扯苦求索	001	001
为儒为吏书香第	001	
洗心绝欲做圣贤	003	
欧风美雨驰而东	005	
穷参中西新学理		
第2章 改革意识付言行	014	014
妇女解放奏先声	014	
微言大义育英才	017	
全面发展德智体	019	
逆乎常纬之为学	023	
誓将手植万树桂		
第3章 激荡神州维新潮	030	030
进化论释经世志	030	
全面改铸孔圣人	036	





002

治安一策知难上	038
公车上书天下惊	042
齐头并进促维新	048
伏阙忧危数上书	052

第4章 百日维新终流产 060

光绪皇帝座上客	060
世界意识惊皇上	063
除旧布新推新政	068
苦无良策挽时局	070
思想文化新潮涌	074

第5章 浪迹海外誓保皇 079

九死一生吴淞口	079
流寓日本频交往	081
忠君爱国保皇会	083
一意孤行拒革命	085
保皇革命分两途	090

第6章 尽善尽美大同世 096

社会主义之空想	096
去苦求乐是人道	101
天赋人权求解放	105

康有为
KANG YOUWEI

003

大同理想的剖析 —————— 112

第7章 环球之旅察政治 —————— 116

遍尝百草为神农 —————— 116

走向革命对立面 —————— 121

第8章 一代伟人自沦落 —————— 126

虚君共和发奇论 —————— 126

鼓吹孔教之巨子 —————— 129

“丁巳复辟”一文圣 —————— 133

天游化人晚年景 —————— 137

是非功过说纷纭 —————— 144

附

年谱 —————— 149

主要著作 —————— 152

第 1 章

东寻西扯苦求索

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标志是放眼新世界与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冲击。洋务派、早期改良派与维新派，不同程度地有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着。承担这一任务的主体，不可能来自下层群众。即使如太平天国这样高水平的农民起义，到南京后便热衷于向巩固自身的皇权进军了。这说明社会改革的新见解必然发自中上层一些有识见、有抱负的人。近代中国耸动人心的改革方案，是由康有为这样出生于儒学传统门第、又有向西方文化苦苦探索历程的人提出来的。对这一方案的缔造者康有为早期生涯的了解，是探索他的改革思想与行动前无法跨越的一环。

为儒为吏书香第

康有为的家世，具有“为儒为吏”的特色，是从康世尧（第 15 代）开始的。康家发迹始于其高祖康文耀。康文耀在家乡讲学，前后有生徒千人，并建起了康氏家庙。继承了家学的康式鹏，是康文耀的幼子。康式鹏有四个儿子，除三子康自修



生平未详外，康学修、康道修、康赞修都担任过相当于县一级的小官。康赞修的长子康达初是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在康有为 11 岁时就去世了，启蒙教育落到了祖父康赞修的肩上。

康有为八岁起就在祖父身边读书诵经。康赞修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历任钦州学正，合浦、灵州、连州训导。11 岁的康有为，跟祖父住在连州官舍里。康赞修引导康有为阅读儒家经典与历代文学著作，侧重在史学。康有为回忆说，览《纲鉴》得知古今，观《明史》、《东华录》而知掌故，并阅读了《明史》与《三国志》等。由祖父之引导，康有为在儒学、文学、史学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858 年的 3 月 19 日，康有为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今名银河乡）。南海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南部，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他家的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是他青少年时代勤奋学习的地方。两座楼，是他叔祖父康国器建造的。康家的兴盛始于康国器。康国器在咸丰初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于清廷，官至广西布政使，升护理巡抚。他是康氏家族中唯一得此显荣者。同治四年（1865），康国器新授福建按察使，衣锦回故里，便筑宗祠、修园林，藏书于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中。康有为在优雅的环境里，读书园中，纵观说部与集部方面的著作。

康有为有书不读完绝不罢休的拗劲。康赞修公事之余，常带他游览连州诸名胜，如宋代理学家张栻的濯缨堂、敬一亭遗址。谈古论今，圣贤之学，先正之风，寺观之祖师、儒学之大贤，以及碑帖诗文中文学名士，皆随时指告。这激发了康有为的希圣之心，开口闭口不离“圣人”。乡亲们因其名叫“有为”，给他起了个“圣人为”的绰号。



003

1870 年康赞修调任省城广州。康有为跟祖父在广州到处寻师访友，遨游士林，博览群书，学问与日俱增。但他对八股文缺少兴趣，引起祖父的责备，只好去学习八股制艺。1877 年，祖父去世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以至三十多年后，康有为在为其乃祖遗集作序时，感恩的心情跃然纸上，说天天沉浸于古代贤哲之微言大义中，都是康赞修教诲的结果。就康有为祖先的情况看，大多是清廷的地方官吏，更多的人是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传播的士人。出身于为儒为吏这样的书香门第的康有为，17 岁时看到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瀛环志略》于 1848 年刊行，作者撮录中外有关著作，对各国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及社会变迁均有论述。这是一本与魏源《海国图志》同为中国较早的世界地理志，由此书康有为知道万国之故。康有为从中获得的域外知识是很浅薄的，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正是从粗浅的史地知识开始的。视野开阔后的康有为，常感到的是不满足。他自己说，当时窥书很多，见闻杂博，但东挦西扯，苦无一位良师做向导。对康有为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位名师以期取得指导。

洗心绝欲做圣贤

这位老师，就是世人尊称为“九江先生”的经学家朱次琦。朱次琦（1807 ~ 1881），广东南海人。咸丰二年（1852）任山西襄陵知县，因病回原籍。自 1858 年起，在九江礼山草堂执教二十余年，讲学终老。朱次琦是康有为之父康达初的老师，祖父康赞修的好友。光绪二年（1876），19 岁的康有为，应乡试不售，又感学业之无成，便拜朱次琦为师。



在学术旨归上，朱次琦以程朱理学为主，兼采陆王心学。强调读经之目的在经世致用。康有为从师朱次琦后，感觉如同旅人找到归宿、盲人重见光明一样。他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一是30岁前读完群书，二是不再作八股文，三是洗心绝欲做圣贤。他黎明即起，夜半才睡，研究了先秦诸子哲学，博览了唐代和唐代以前的诗文。善于思索而不盲从的康有为，其学术旨趣却不同于乃师。

学生和老师之间，在如何评价韩愈上发生了分歧。朱次琦推崇韩愈，尤赏识《原道》一文。康有为以为，《原道》是一篇肤浅的文章，韩愈只是浪有大名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朱次琦觉得，这个年轻人太狂妄了。疑窦在康有为身上产生了，他觉得读完群书，也是拾人牙慧，难以独抒己见。于是闭门苦思冥想、静坐养心。有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感到光明大放，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有时想到人世间的困苦，就闷然而哭。同学见他歌哭无常，以为他是一个狂人。康有为觉得，有了“万物一体”之感，就是“圣人”了。礼山草堂三年攻读，没使他悟出人生的真谛，便在1878年冬，辞别先生回家了。

朱次琦力主经世致用的学风，对康有为影响是深邃的。康有为虽赞同陆王心学，但对其蹈虚的学风并不赞同。学风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康有为生活的时代，一面是廊庙蠹朽，国土沦丧；一面是列强环伺，蚕食鲸吞。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悲喜剧，在神州大地上反复映现。在后来康有为的讲学实践和维新变法中，不难发现朱次琦经世致用学风于他身上烙下的痕迹。1881年，朱次琦撒手人寰，康有为如丧考妣，连夜赶到礼山草堂，与弟子们营造坟墓，主持丧仪，称朱次琦的学说平实而敦大，



005

溢美之情，油然可见。

离别老师的康有为，彷徨无依地回家了，郁郁不乐的他想起了风景优美的西樵山。“桂林山水甲天下，南粤名山数二樵”，是广东人形容家乡风景的谚语。“二樵”是指博罗县的东樵山（亦名罗浮山）和南海县的西樵山。东樵山以雄伟壮丽著称，西樵山以清幽秀美闻名。在灵山秀水的胜境里，康有为读了不少书，并面壁参禅，以求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但他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这时，康有为认识了到西樵山来游玩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之后康有为与张鼎华交往甚密，并从他那里触及近代新思想，眼界为之一开。再后来，康有为出西樵山，返银塘乡，决心以经营天下为志，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于唐宋历史与宋明理学刻苦钻研。1878年刚刊行李圭的《环球游记新录》，使康有为初步了解到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风貌。这部游记是李圭1876年去美游历的实录。李圭向中国人介绍了一个工业文明的世界，是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一部美国游记。此时已家道中落的康有为，尽管为此书所动，但却无经济力量远游美国。对康有为来说，近在旁边的香港是有可能去的。

欧风美雨驰而东

1879年，康有为到了香港。欧美风俗与文化，动摇了他原先所接受的那套传统偏见。宫室的瑰丽，道路的整洁，巡捕的执法，使他知道西人治国是有法度的，不得以传统的夷狄视之。初游香港，两种不同文化在康有为心中所激起的涟漪，尽管不甚激烈，却是一种反思的觉悟。

康有为的反思，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夏指中



原地区，夷指四周少数民族与外邦的称呼。儒家自孔孟起，就强调夷夏之辨。夷夏之辨强调，汉族在文化上比四邻少数民族要高明，要以华夏文化去感化中原之外的化外之民；华夏与夷狄的划分，以是否接受与推行华夏文化为标准。这在历史上成为汉民族同化少数民族的包容机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严夷夏之防，是一种文化自大主义，有鄙视外来文化的心态在内。历代统治者，都自居于天朝上国的地位，不愿意与少数民族的国家处于同等的基线上。到了清代，文化自大心态更形加剧。鸦片战争前后，文化自大主义已扩大到应用于西方列强，如把英叫“英夷”，把办理外交叫“夷务”。在通商、政治交涉中，处处要显示出比“夷”高出一等。传统的夏夷观念，成为顽固派盲目排外的借口。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后，各大使馆相继在京成立，面临一大难题就是使臣的“觐见”问题。朝内大臣辩论三个月，不少官员主张，外国使臣不拜皇帝，不符大清之定制，有失朝廷尊严。但战争以其暴力手段所造成的权威性，迫使人们去认识对手的实力。林则徐从自大与闭塞风气中走出来，他派人探听洋人的情况，主持编译《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成为风云际会中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主张超出夷夏之辨的视野，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西方。这是时代波涛的鼓荡下，克服天朝上国心态的新视野。康有为初游香港，得出对西方“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的结论，也属新视野之列。1882年的上海之行，是他向西方学习中的转折点。5月， he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南归途中路过上海。他到租界兜了一圈，虽痛感国家主权的沦丧，然上海的繁盛景象，坚定了他西人治国是有法度的想法。强烈的求知欲与民族的责任感，使他

在上海大量购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书。据张伯桢《万木草堂始末记》记载，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印的西学新书，30年间售出不逾一二万册，而康有为“购以赠友及自读者，达三千余册，为该局售书总数四分之一强”，为当时中国头号购买西书的顾客。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近代西学东渐中是有重要作用的。近代中国开头 50 年，西学输入中国，大半通过上海。全国译书机构，较重要的凡 10 家，上海占其 7；西书的翻译，80% 由上海承担。上海的译书机构，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主角。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晚清历时最久、译书最多的译书机构，也是译书质量最好、影响最大的一家。创办于 1868 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 1871 年出了第一本书，到停办时共出了 160 种书。所译之书都是首屈一指的，多为西学传入近代中国的开端或代表作。数量既多，质量上乘的译书，对康有为影响是至深的。返粤后，自言大讲西学，尽释故见。这次外出，使他坚定了学习西方的决心。在变法过程中，他常向光绪帝呈送西学新书，把自己的感受记录在卷，他成了光绪帝的西学启蒙老师，推动了戊戌变法的进行。这与他早年在上海大购西书是有关联的。

穷参中西新学理

香港之行与上海之旅，使康有为把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国家兴衰联系起来思考。回到家乡后，康有为自述当时的情况说：“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对“中西新理”参究的结果，体现在他的早期著作《诸天讲》、《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



书》中。

康有为自述，28岁时，在西樵山北银河乡澹如楼，因读《历象考成》而观天文。他用望远镜见到了火星的火山冰海，并推论其他星球有类似情况，由此作《诸天书》。这部作于1886年，晚年有所补充的《诸天讲》，是康有为留存下来的唯一的自然科学著作。他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探讨了宇宙（“诸天”）的形成，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天体力学；赞同康德的“星云说”，并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为他的改革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康有为表示，自己“最敬哥、奈（即牛顿）二子”。依据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天体力学，康有为反对中国传统“天上地下”的宇宙结构论旧说。在他看来，这是古人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以肉眼测天的结果。西方人用望远镜，可看到土、金、火、木诸星与地球一样，都是围绕太阳的行星；用显微镜可见到人体中的毛细血管，可见到水里的小虫跟大象那样大。技术手段的改进与提高，可以达到事不离实的地步。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变更人们对宇宙结构的陈旧见解。星运行于天，从别的星球看，地球也是在天上运行的，从不同的参照物来观察，绝不存在着“上天下地”的情况。这是不同于古代传统的一种新的宇宙结构学说。

康有为向国人介绍了“星云说”。“星云说”由康德在1755年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是关于太阳系起源于原始星云的假说。这种假说认为，太阳系天体是从同一团固体尘埃微粒组成的弥漫星云中，通过万有引力作用逐渐形成的。星云最初分布在比太阳系大得多的空间内，因万有引力作用，微粒相接，逐渐形成团块。较大的团块成为引力中心，中心体因

不断吸引四周微粒和小团块而壮大，最后聚集成太阳。有些微粒在向中心体降落的过程中，因相互碰撞，向旁偏转而围绕中心体做圆周运动，这些微粒各自形成小的引力中心，最后聚集成行星。行星周围的微粒按同样的过程聚集成卫星。“星云说”认识到宇宙有一个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对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具有近代科学因素的宇宙观，是康有为变法理论前提条件之一。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创立，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冲破神学桎梏而诞生；17世纪牛顿力学的建立，显示出人类对宏观世界低速运动规律认识上的飞跃；18世纪中叶康德“星云说”的提出，象征着人类于天体世界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科学认识的开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本质上是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它不但全面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能积极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对人们意识的变化。具有改革意识的康有为，是与他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相关的。

《康子内外篇》撰于1886年。据他自述，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全书共15篇。内中透露出科学精神、理性之光、人道主义等与西方相关的文化气息，但却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表达出来的。近代中国是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如何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欺凌，获得解放？百余年来，志士仁人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前仆后继。向西方文化学习什么与怎样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近代贤哲所关注的课题。古与今、中与西的争论与交融，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乐章的主旋律。戊戌变法时的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论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是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性高潮。有高潮，就有前奏曲。对古今中西



之争，《康子内外篇》已有所考虑了！

理性的曙光，是同康有为主张的人禽之别在于“智”的见解相联系的。“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在智。”“智”指知识与理性。康有为指出，万物皆有仁、义、礼等道德意识，并非人类的专利。如鸟类的反哺、羊羔跪地吮乳，是仁的表现；犬拼死以卫其主，是义的体现；鹿群呦呦相呼、蚁群行列有序，是礼的反映。但禽兽独缺的是“智”。这同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在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尽管自先秦以后，哲人与学派的争论从未中断过，但争论各方一致地赞同人禽之别在于是否具有道德意识。自先秦孔、孟、荀，经董仲舒一直到朱熹、王阳明乃至王夫之、黄宗羲，均主张人比禽兽可贵是在于“有义”。“义”是维护封建尊卑秩序和贵贱上下的伦理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不“义”之人历来被看作不齿于人类的禽兽。人贵在于“有义”的这一价值观，使传统文化具有重德轻智的倾向。此一道德价值至上的判断，使传统文化对求知有所忽视。与西方文化相较，中国文化确实缺乏一种独立的、发达的知识论系统。

人的本性在求知，人贵于万物而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理性，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古希腊文化，是以对自然的观察和形式逻辑的分析为基础。它要求依据理性确定对象的因果关系，获取必然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讲，“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可从这一意义去理解。中世纪以后，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等贤哲，均从本体论的高度构筑了理性主义哲学体系。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把理性引申到社会、政治领域，理性成为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基石在于人

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观念。理性是与人的认识能力相关的哲学范畴，是同人获取知识、求得真理密切关联的。康有为的“智”，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这是康有为“参中西之新理”后，提炼出来的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概念。

理性主义是康有为同传统的流俗与积习决裂，提出叛逆性的改革思想的哲学依据。1891年他在《长兴学记》中，提出了“逆而强学者智”与“夫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的命题，就是强调人要发挥能动性来学习知识，学得愈多便愈敢于对传统进行抨击，便愈有智慧，在当时具有不可忽视的反传统意义。

对理性之光的钦慕，是康有为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的内驱力。理性是和科学相伴的，理性的目的是通过正常的思维途径，对客观对象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科学是这种认识的理论形态。在《康子内外篇》中，处处可见近代科学的渗透。科学的进步，为人类开阔视野、认识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借助电线，可顷刻传信息于千里之外；靠留声机，可让语言传于数百年之后。这在道光、咸丰以前的年代里，虽是巨学鸿儒，必讥为妄说，但在现在，就是连小孩也懂得是日常知识。

炽热的人道主义，使康有为摒斥了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是一种要求人们在一定范围内克制欲望、放弃物质享受，以达到宗教理想、道德完善的学说。“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的宗旨所在。康有为强调人的欲望是正当的、不应禁绝的。人的欲望来自形体，是“天”所赋予的，这是一种自然人性论。康有为强调，“我”是个有血气、有觉知的主体，对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欲望，一定要遂其所欲，给其所求。这是具有近代因素的人道主义。